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论马华与马来文学的 “513”政治抒情诗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olitical Lyric Poetry of
“May 13” in Malaysian Chinese and Malay Literature**

ULSZ 3094 Project II

黎家恒

Lei Jia Heng Bryant

17ALB03942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1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4
第三节 文献综述	6
第四节 研究价值	8
第二章 叙述 513 的手法	11
第一节 重返历史现场	12
第二节 后 513 叙事	16
第三节 想象、回忆、追溯 513	18
第四节 小结	21
第三章 意象的运用	23
第一节 513, 1969 作为数字意象	24
第二节 黑羊, 隐藏的黑手作为象征意象	26
第三节 风雨、阴霾、都市抒情意象	28
第四节 法令、牢笼等的批判意象	30
第五节 小结	32
第四章 结语	34
引用书目	36
附录	39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使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黎家恒 LEI JIA HENG BRYANT

学号：17ALB03942

日期：2021 年 4 月 23 日

论文题目：论马华与马来文学的“513”政治抒情诗

学生姓名：黎家恒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博士

校园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513”已经离我们有 50 年了，可是国人一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讨论“513”。政客借用“513”捞取他们要的政治资本，为了其政治利益着想。因此，做为社会一份子的诗人借用了政治抒情诗成为了读者了解“513”的另外一种方式。本文将会通过文史互见、文本细读法和比较诗学进行研究。诗人认识“513”后，将自己的看法通过了“回到历史现场”、“后‘513’叙事”和“想象、回忆、追溯‘513’”的方式，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语境了解“513”。本文也将会探讨与“513”相关的诗歌中，所使用的“数字意象”、“黑羊、阴藏的黑手象征”、“风雨、烟霾的都市抒情意象”和“法令、牢笼等的批判意象”。政治抒情诗中相似的意象是频频出现的。通过两个不同语境的诗歌进行比较，我们希望可以弥补正史留下来的空白，因为“513”带给两大族群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不少的国家政策。两种语境下的诗人都无法苟同“513”的发生，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历史。因此，诗人便将他们所知的历史，配合自己的意识，缔造文学的“513”。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提高人们对于“513”的认识，也鼓励人们从文学的角度切入“513”，检视 50 年前的暴乱。

【关键词】 “513”、马华、马来、政治抒情诗、比较研究、意象

致谢

这份论文得以完成，必须感恩父母，感恩他们无限支持我完成这份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母亲的大病，是我努力完成论文的动力。家里的二老所给予的支持和吾弟的配合（不干扰我写论文），使这份论文可以如期完成，顺利呈交。

我也感恩丽丽老师，她在我选定题目后，给予我指导，并多次提供我新的研究思路，使这份论文能够为日后的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得比较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我也谢谢老师鼓励我继续在华马比较的范围内耕耘，让我在完成论文后仿佛又有了新的目标。

此外，我也感谢我的几个好友，尤其是裕穆、俊湧、家正、乐天等人。他们愿意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我的话筒，听我诉说做论文的苦与乐。谢谢你们愿意在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听我诉说所有的一切。

我想要感谢美富老师，他虽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却无私地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丰富我的知识。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的每一位老师，是您们丰富了我的阅历，让我大学生涯三年无悔。

我也特别感谢马华诗人吕育陶，通过这份论文让我认识了吕育陶，他也乐意分享他对 513 的看法和心得。我也感谢博大的庄华兴老师，通过他找到一些相关的诗歌，丰富了我的参考资料，也感恩他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些看法。

一、绪论

政治是管理众人事物的行业，涉及了人如何被管理和管理人。¹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就无法离开政治。因此，做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和政治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诗历来是民族心灵状态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天气预报图”²，诗表达了诗人的生活。当遇到政治问题时，诗人会借由自己的文采，将自身对政治的看法与评论，借由诗的文体，表达出来。

政治抒情诗的特征有三，分别是取材的强烈政治事件，直接表现诗人对时代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价。另外，政治抒情诗在艺术上也讲究政论性和激情的结合以及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感染力。³“513”事件⁴是在马来西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件之一，诗人们针对 513，配合激情或抒情的文字，鼓动了读者的感染力，使 513 相关的诗歌变得更具有政论性。

513 官方报告指出，在这起事件中 共有 196 人死亡，180 人受伤。⁵并描述我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动⁶。时任副首相 Tun Abdul Razak 表示种族之间的摩擦一直以来都存在，我们的任务应是拒绝摩擦，团结我国各族人民。⁷官方报

¹ 曾维龙，〈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05。

² 王昌忠，〈诗歌政治写作的合理路向〉，《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 期，页 163。

³ 荣光启，〈政治抒情诗〉，《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123-124。

⁴ 下文的 513 所指的就是“513”政治事件，并不会再重复加上引号，谨以 513 进行描写，但所指相同。在大马的政治语境之中，513 除了是一组数字，更是描述了这起族群冲突。

⁵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Majlis Gerakan Negara;1969), 97.

⁶ “Negara kita telah menerima paluan yang sehebat-hebatnya pernah dialami meletusnya rusuhan antara kaum.”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Majlis Gerakan Negara;1969), iii-iv)。

⁷ 敦阿都拉萨在《513 事件报告中》序中坦诚，独立以后的马来（西）亚子民都是依照自己族群的想法进行生活，并没有更多的跨族群的生活。当然在他的绪论中，将 513 事件视为有心人士

告将暴动起因定为黑社会涉及政治 (Kongsi Gelap dan Politik)、各政党的僵持 (Ketegangan Terpimpin) 以及反对党庆祝胜利的游行 (Perarakan Kemenangan)。可当柯嘉逊调阅了英国档案局的记录后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⁸他认为这场种族暴动绝对不是因为马来西亚多元的种族所造成的, 而是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推翻落后的马来贵族的政变。⁹代表马来贵族的时任首相 Tunku Abdul Rahman 在这起事件以后引咎辞职, 而代表新型马来官僚的时任副首相 Tun Abdul Razak 则接任首相。¹⁰首相的替换也意味着新兴马来官僚阶级战胜了马来贵族, 掌握国家的权利。

从这些证据当中我们得知, 513 不只是一件执政者拒绝下台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也不单纯的种族暴动, 而是一场利用大选以进行某一种政治目的。它借由种族之间的摩擦引起的政治事件, 并达成其政治目的的种族暴动。这起种族事件中, 后人普遍认为马来人是这场暴动的策划人, 而华人则是这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人们对于这起事件有许多的看法, 并认为这是一场以马来族群为首的种族暴动, 目的就是要对付在马来群体眼中的“外来者”。这种讲法渐渐在马来人与华人间流传开来。

诗人遇到政治事件时, 将创作天赋和所听所闻联合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写成诗, 借诗寓情, 配合诗人抒情, 形成政治抒情诗。因此, 经了解政治事件后,

想办法将国家刚刚建立的体制毁灭。(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Majlis Gerakan Negara;1969), iii-iv)。

⁸ 柯嘉逊在他的著作中的《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中坦诚这场种族之间的暴动, 其实是来自巫统内部的右翼势力向至高无上的权利进行挑战。(柯嘉逊, 《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八打灵, 人民之声, 2013), 页 8-9。)

⁹ 柯嘉逊, 《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八打灵, 人民之声, 2013), 页 2-3。)

¹⁰ 敦阿都拉萨在 513 事件后, 便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 (Majlis Gerakan Negara), 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期间担任国家行动理事会的主席, 维持国家的秩序。国会因而停摆两年直到 1971 年复会。

诗人会对这些政治事件，进行不同的叙述。马华与马来诗人对于 513 自然也会有各自的表述与看法，本文将会比较这两个不同语言群体的观点与看法，并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513 通过政治与历史的研究，已渐渐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文学角度而言，文人从那时候的亲身经历，到如今回忆与追述，将 513 以文学的方式写出。文学将 513 从缺乏生命的历史与政治事件转型成活生生的文字。文学的 513，对这起政治事件进行了反思与重述。这些表达的方式也在诗歌中体现，形成了具有文学色彩与张力的叙述。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 513 发生时，诗人所写的马华与马来诗歌，或是通过回忆与追述的方法描写 513 甚至是 513 带给诗人的创伤以及诗人对这事件的看法。513 在华裔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种“过不去的坎”。此外，政治圈子中，513 就是各个政治人物各自发挥的舞台，部分马来保守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向选民喊话，不要投给某政党，以避免 513 重演；华人保守政治人物向选民喊话，不应投所谓 513 的幕后政党。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政治算盘，为 513 加入特定色彩，使国人离不开 513 的魅影。

诗是一种特殊文学体裁，将难以描述的事物，借由文字的简练，真实地将其表达出来。诗可以针对时下政治或者时事提供实时的反应与感受因为较容易穿透到各个人民阶层中，效果也比起其他的文学体裁来得更加快。这是因为诗

的遣词用字十分简练，更有效传达诗人的思想予其读者。正因为这些原因，诗成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向。政治抒情诗是诗人表达自己对的治情感的一种方式。通过政治抒情诗，我们可以了解诗人对于当下时事的检视，也能试着从另外一个视角找出诗人对这起困扰好几代人民的 513 的看法。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诗人在大环境下，自然也会对 513 进行反思，并为它进行重塑和重构。这些是本文的研究动机，并试着将其探究与考证。

文坛中，针对 513 事件而衍生马华与马来诗的政治书写进行比较的论文似乎遭到忽略。因此，本文将会从这研究，试着从 513 的马华与马来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清楚看出华人与马来人具有理性去看待 513，并非被政客所煽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希望借马华与马来政治抒情诗，探究大马两大族群对于 513 的看法，找出这些看法与正史的异同，进而在未来进行跨族群的对话，促进团结。通过政治抒情诗，尝试以诗证史，探究 513 在马华与马来族群的地位及其影响。

（二）研究范围与方法

对于研究方法，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式是“文史互见”。文史是文学、史学的著作或相关的书籍。文学作品中有历史事件或者借历史事件所衍生的符号与意象，这样就可以借用文学的方式研究历史，形成“互见”，相互对照。因此，我们应该先从这些文学作品开始，再与《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513 解密文件》，《当今大马》所制作《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的专题报

道以及国家行动理事会所出版的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从各个视角检视 513，并与文学的 513 对照，尝试拼凑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这篇论文所使用的是文本细读法 (Closed Reading)。所谓的细读，就是将文本中的语言做出详尽分析和解释，在诗的冲突和张力的基础上掌握诗的内涵。¹¹马华文坛中，吕育陶的诗歌写实又有现代主义写意手法以及后现代主义颠覆嬉戏书写技艺所写的诗歌，傅承得的诗歌特征则是写实兼写意的特征。¹²本文将针对他们及其他相关的诗歌筛选出来，并与 Said Zahari、Usman Awang 等人的 513 诗歌进行探讨。我们通过细读法，掌握诗的冲突和张力，完整诗的内涵。

比较诗学研究也是我们所使用的。我们研究马华与马来诗歌，就必须涉及了“比较”和“诗学”的讨论。“比较” (compare) 是考察“共同”的事物，发现其不同与相同之处，找出其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诗学” (poetics) 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揭示诗与社会的联系。¹³当这两者并谈时，就必须将两种以上的文体¹⁴成为研究客体，这里就是可以是马华与马来诗成为了此文的研究客体，将历史与文化在“四个跨越”¹⁵中进行比较研究。513 马华与马来政治抒情诗必须在这“四个跨越”中进行探讨，找出他们的异同。

¹¹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¹² 李树枝，〈感时忧族（国）：论“五一三”事件后，马华文学的“五一三”与“后五一三书写”〉，《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页 126。

¹³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 383。

¹⁴ 这个文体必须是出现超过两种语言或国家，才可进行比较。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此文中不复存在了，只是单纯的文本之间的比较。

¹⁵ 这四个跨越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以及跨学科。（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页 392。）

（三）文献综述

513 影响了国家的未来。后人大部分探讨和研究这件事都是从政治与历史事件的角度进行研究。513 后改变了国家的政经文教，政治方面而言，当时的执政党，巫统联合其他的反对党¹⁶，组成了最大的政治联盟；经济方面而言，新经济政策¹⁷的推出，改变了国家的经济方针；从文化层面而论，国家文化政策¹⁸的推出，将马来文化从与其他文化从平起平坐的地位走向主流化；教育方面而言，因“513”后，国家文化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推出，马来族群要求政府设立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以致所有的国立大学都需要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¹⁹这也使后人在研究这起种族暴动时，都会以相关的视角包括政治、历史、经济的视角去研究 513 事件。甚少人从文学角度讨论 513 直到 21 世纪开始的马英文学。

郭紫薇 (Florence Kuek) 在其研究²⁰将 1969 年到 2019 年对 513 回应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经她整理，总共有 32 篇文学作品对 513 进行描写，有 14 篇是 513 的马来与马华政治诗。她的研究将“513”作品整理，为日后之研究提供

¹⁶ 巫统联合了许多的反对党，包括了当时在檳城大胜的民政党 (Gerakan), 回教党 (Parti Islam Se-Malaysia) 以及砂拉越民族党 (SNAP)，人联党，人民进步党等，组成了国民阵线 (Barisan National)。

¹⁷ Dasar Ekonomi Baru 《新经济政策》，主要就是全面消除贫穷以及进行社会重整，摒弃固有经济功能的种族认同。

¹⁸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国家文化政策》，将马来文化塑造为主流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是塑造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¹⁹ 江伟俊，〈单元下的多元——马来西亚的语言权力状况〉，《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17 年第 2 期，页 17。

²⁰ Florence Kuek, "Post-trauma: A Comparison of the Malay and Chinese Psyches in Response to the May 13 Tragedy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from 1969 to 2019",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49.7(July 2019):43.

坚实的基础。惟，她并没有对马华与马来政治书写进行比较讨论，这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至于 513 的马英文学，Grace Chin 在她的研究²¹中谈及了余长丰（Ee Tiang Hong）就已经写下 *Myths for a Wilderness* 诗集，当中的 *Requiem* 就谈及了他对 513 的失望，“tell your children to remember or tell them to forget” 就已经知道他对于 513 事件的失望以及无奈。除了余长丰，还有另外一位诗人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在她的回忆录 *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中谈及她依然离开马来西亚是因为在 513 事件后失去对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理想了²²。513 后让华社失去建国初期政治博弈的对等位置，转而沦为国家主流体系外边的边缘人/系统²³，使华社不愿提起 513。

研究 513 的马华文学学者包括了曾维龙、李树枝、郑政恒、许德发、张光达等人，他们通过各个视角对（后）513 的马华诗歌进行探讨。他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吕育陶、傅承得等著名政治诗人。郑政恒在他的研究中就谈及了更多诗人在 513 的三年所出品的文章，并对此进行大量的描述及研究²⁴。这些诗人包括了赖敬文、绿浪等诗人对当时发生 513 后的立即回应。

²¹ Grace Chin, “The anxieties of Authorship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an Writings in English: Loca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Writer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dom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Postcolonial Text* 2:4(Jun2006):8.

²² Grace Chin, “The anxieties of Authorship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an Writings in English: Loca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Writer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dom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Jun2006):8.

²³ 曾维龙，〈后五·一三马华文学的“诗性”与“正义”——马华文学史的另一种描述〉，《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页 422。

²⁴ 郑政恒，〈五一三事件后马华诗歌呈现的政治创伤〉，《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页 534。

马来文学中，鲜少针对单一事件进行回应，他们针对宏观的课题进行探讨与研究。我们能从各个诗人的作品集之中找寻到相关的诗歌。与 513 相关的政治抒情诗就用 Baha Zain、Usman Awang，等人的写作。此外，当时马来先锋报（Utusan Melayu）的主编 Said Zahari 针对这起事件写下了 *Tangan-tangan yang Tersembunyi*，并因与当权者的抗争，而面临牢狱之灾。

由此可见，513 的研究概况和相关主题是非常丰富的，三大语言的文献资料是充分的。此论文则是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努力下，从马华和马来文学政治抒情诗探析诗人笔下的 513。

（四）研究价值

513 自 1969 年发生，直到 51 年后的今天，却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地写出来。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起事件影响了华人的权益日渐下滑，渐渐变成了如同“二等公民”²⁵的感受；从政治角度而言，新的政治联盟的成立，也无形中打压了非土著的政治权利。诗人遭遇种种压抑却难以伸张的情况下，就将他们的想法在诗歌中表达。许多真相没有办法完全地展现，使 513 成为了历史的魅影和伤口。史书无法完整呈现，部分事实被隐瞒与遮蔽，成为了大马人心目中的禁忌，无法明目张胆讨论。伊党最高理事 Dr. Ridzuan Mohammad 在 2019 年，在

²⁵ 509 全国大选前，时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坦言，大马华人存有“二等公民”的看法，是国家政策将人民一分为二，分成土著和非土著。新经济政策加强了土著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地位。（〈政策使华裔感觉像二等公民，马华看到在朝的必要〉，当今大马，2018 年 5 月 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23049>）

Harakah Daily 发表了 *Belajar dari Luka, Getir Sejarah* 就写道：513 事件是我国（族群）共同关系失败的标志²⁶，他希望全体人民都必须远离沙文主义者²⁷，避免族群暴动。513 是国人不可触碰的逆鳞，因此诗人们只好借由文学将 513 呈现，形成 513 的文学。因上一代人对于此事件的恐慌，就算诗人们想谈 513 也会闪烁其词，使 513 文学增添了神秘与朦胧的色彩。本文选择从文学的角度诠释 513，尝试扒开这些神秘的面纱。单篇论文中，直接进行比较的极少，因此本文以这两个不同的语言中诗的文学艺术角度进行研究，使这股被人遗忘的声音展现出。

2018 年，我国成功实现政党轮替，在野的反对党（希望联盟）²⁸在全国大选中囊括了多数议席，并组成了政府。可是，国家没有发生“所谓”513。²⁹我们希望借由马华马来文学的政治抒情诗，探究 513 对这两个族群的感受以及影响，尝试借用文学将将这起被大马政府有意尘封部分历史的政治事件呈现出来。人民得知此事后，将不再被政客所利用以及恐吓，使极端的政客无法分裂各族群以捞取政治选票。人民应超越族群，客观评价 513，再从诗歌中减轻历史的“包袱”，避免族群暴动。华人不应以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 513，因对于

²⁶ Peristiwa 13 Mei adalah mercu tanda kegagalan hubungan komunal negara ini. Ada yang sinis telah membakar kereta untuk menyambut kemenangan parti pembangkang. Sebahagian kaum Melayu telah membawa senjata pedang dan parang untuk memulakan babak-babak rusuhan antara kaum. ("13 Mei: Belajar dari Luka, Getir Sejarah," Harakah Daily, accessed Oct 31, 2020, <https://harakahdaily.net/index.php/2020/05/13/13-mei-belajar-dari-luka-getir-sejarah/>)

²⁷ Chauvinist, 指的是 极端不合理过分的爱国主义分子，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视自己的群体为独一无二。

²⁸ 希望联盟，又称希盟，由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国家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所组成。他们与沙巴的沙巴民族复兴党共组政府，取代败选的国民阵线（国阵）。惟，土著团结党于 2020 年 2 月离开希望联盟，与国阵、伊斯兰党以及砂拉越政党联盟共组联合政府。

²⁹ 513 的发生就是当时的执政联盟（联盟）无法取得绝对支持率，以致发生族群暴动。

马来西亚人而言，大家都是受害者，513 的得利者只有政治人物。本文就在这种想法下进行研究探讨。

二、叙述 513 的手法

“历史”联合了客观与主观，是发生的事情本身亦是对发生事情的叙述，也是事件统一发展的过程。³⁰要将这些过去的事情，进行记录与反思，就需要将其进行诠释。对 513 的诠释对了解事件非常重要而叙事手法在诠释过程中十分重要，应将了解（Knowing）转成可讲述的（Telling）³¹，使一个历史能被一般人所接受的，成为一种谈论事件的方式。

513 是一场人为的种族暴动。官方记录³²只是为 513 这提供了“Knowing”的方式而要能“telling”513 则需要更多的资源。柯嘉逊在《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513 解密文件》提供了部分与官方报告不同的见解，认为 513 是因为巫统当内的政治争斗所造成。Abdul Rahman Ibrahim 的 *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 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认为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导致这场暴动。从这得知，大家在看待 513 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一样的叙事手法。

³⁰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101-102。

³¹ 叙事（narrative）来自拉丁文的 *gnarus*，意思为了解（knowing）和拉丁文地 *narro*，意思是陈述（relate），也带有了解（know）的意思。（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页 1-3）。）可以这样解释，“knowing”可以是叙述者针对事情所了解的，这里必须假设他所知道的相关事件是真实的，这样才可以对的上“客观事物”。之后，当他想要把这件事情转述至任何的地方，就是事件加上了自己的主观想法，使其变得可以“telling”。可是，这个“telling”不再是纯历史，而是经过加工的历史，是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历史”。

³² 官方的记录“*The May 13 Tragedy*”便在当时的国家行动理事会的调查之下，完成报告。

马来与马华政治抒情诗针对 513 所进行的描述，也会根据历史材料的不同，从回到历史现场、后 513 的描述以及通过想象、回忆和追溯 513。本章将会从这三个方面下手，讨论这三种叙述 513 方式。

（一）重返历史现场

陈平原在认为走入历史深处就是通过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回忆录而“回到现场”。可是几十年后的追忆，或许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遗忘”，就会被意识心态所“污染”。³³我们无法进入同一条河流，只能是借助各种方法，创造一个“模拟现场”，诗人也在这个创作思维继续发挥，通过诗歌创造一个 513 的模拟现场。

Usman Awang 的 *Kambing Hitam*³⁴就是典型的当下描写。*Kambing Hitam* 的副标题就是“Sebelum dan Sesudah 13 Mei”，印证了诗人是针对 513 所写的。他也在诗末做了注释说明“Ibu Kota, Mei 1969”，证明了自己是在 1969 年 5 月在都门（吉隆坡）写。“Untuk mereka yang BERJAYA”，描述选前之夜，政客们齐声欢呼着“成功”，可是他故意在这里就停止对他们的描写，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成功了什么”依旧可以“tauke-gendut bibir berlemak”，和这些大肚皮满嘴油光的老板们有说有笑。这就说明了政客的“Berjaya”，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写实描述，印证了底层百姓的无奈。

³³ 陈平原，〈如何进入历史〉，《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页 61-63。

³⁴ Usman Awang, *Salam Benu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Pusaka; 1978), 60-62.

第二段，也就是描写了“13 Mei”所发生的事件。Tidak ada tukaran wang hari ini, harga besi mengejut tinggi”，铁价继续上涨，是因为每一个人，被逼拿起武器上街与对抗暴徒。为了更加具体的描述，“pembeli-penjual saling berebutan”买家和卖家互相抢铁，更加体现了当时无政府的状态。铁导致了“merah senja ibu kota, merah senja warna jalan raya, merah air sungai kelang, merah baju si malang”，到处都是流血事件，甚至有不幸的人身亡。与其形成对比的，当然就是还在电视上“表演”的政客，仿佛当时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因为暴动，所以法庭停摆，街边就成为了“法庭”，“masing-masing pendakwaraya menghujah tanpa bahasa”，人民以暴动，暴力进行他们的论述，而“para hakim menjelma dengan wig merah”，法官就是头上有血迹的暴民。彼此的支持者也就相互叫嚣。Usman Awang 的描述，正如他就在 513 的旁边，以第三视角的方式进行描述。

他更为真实的描述在 513 过后所进行的戒严，“para penggubah dendang Berjaya ke mana hilangya”那些政客消失了，完全将暴动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因为“orang kayangan makan angin keluar negeri”，出国以忘记本身做为参政者的责任。人民在暴乱之后，之能“biskut sekeping rebutan anak-anak lapar”，为了温饱，只能将一片饼干如此进行分配，甚至“beras segengga, seperiuk kanjinya makan sekeluarga”，一锅粥要给全家人吃。这种写实且接近民众的描写，道出人民的心声。

当 513 结束后，政府只好到处去找代罪羔羊，只好将一切的罪名交给“perkauman”、“komunis”、“ultra”、“gangster”，虽然 Usman Awang

写的时候，还没有结束紧急状态³⁵，但是他已经预想到当权者一定会将这场暴动归咎于这些人。事实上，政客不会把 513 的过错归咎于自己，甚至“bertapa larisnya buku 13 Mei”，借 513 刺激自己的选情。他最后认为 513 是一个政治鸦片，513 后，人们开始互相猜疑，当权者就这样就继续玩弄政治。

Usman Awang 描写了从 513 开始前政客们的欢声笑语，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却选择躲避，百姓无奈好典当自己的生命“menggadai nyawa percuma”的惨况。513 后，当权者才开始慢慢找代罪的羔羊，甚至开始“演戏”，“di meja muhibah di kerusi muhibah”，而在之后更是不断重提 513。他在发生 513 的当下，直接写下这首诗，尝试“telling”这件事。这种 telling 的方式在诗歌中成功体现出来。

Said Zahari 的 *Tangan- tangan yang tersembunyi*³⁶ 也是在 513 事件发生不久后发表。诗的副题同样写了写了一句“setelah rusuhan perkauman di Kuala Lumpur”，证明了他是在 513 后写下的。与 Usman Awang 不同的是，Said Zahari 并无直接描述“513”，而是以一个概述的方式将 513 的后果带出来。“Dengan kelakuan liar/ Dalam zaman tamaddun”，在这刚独立且文明的国度中，族群间的冲突，使这个野蛮的行径——513 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个国度。

第二节中的“mencari darah/Si miskin dan melarat”将 513 写成隐藏的黑手找寻穷人与不幸人的血，似乎就回应了那时候当权者的行为。这句与

³⁵ 紧急状态是从 1969 年 5 月 14 日由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建议国家元首实行，并在 16 日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Tunku Abdul Rahman,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Limited; 1969), 105-109）一直到 2011 年，时任首相 Najib Razak 才在国会提呈动议修改《1969 年紧急（公共秩序和罪案方防范）》法令。

³⁶ Said Zahari, *Puisi dari Penjara*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1973), 41.

“*Kambing Hitam*”中的“rakyat si buruh si miskin menggadai nyawa percuma”有相似之处。暴动发生时，无辜的百姓将会遭殃，印证当时的惨状。第三节的“warna, bangsa, agama dan bangsa”被指是制造事端的武器，这同样与*Kambing Hitam*的“perkauman, komunis”等相似，成为政客推卸责任的方式。第四和五节则描写了当时人们因为暴动而无法正常生活的情景，包括“mengunyah pasir”“berbogel, berasakan di gubuk-gubuk usang”，不幸的人只能吃沙，甚至没有一件衣服和庇护所，衣食住行都不能支撑。

诗最后一节用“mencururkan darah si miskin/ untuk bertahan dalam kekuasaan”，利用人民的鲜血以维持政权。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知道 Said Zahari 真实地描写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通过暴动所产生的流血冲突，政客才得以继续掌权。³⁷ 为了自己的政权，不惜利用人民的性命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隐藏的黑手”和“代罪羔羊”，很好诠释了当时 513 的真实。“隐藏的黑手”不断制造恐怖，甚至不惜利用人命，制造一场种族暴动。他们当下的描写，尝试将 513 从他们的“knowing”转换成“telling”。当需要找寻为这场暴动有所负责的时候，一些不幸的人就被逼成为了“代罪羔羊”，为这起事件附上全责。“隐藏的黑手”以胜利者的角度站在人民面前宣称他们已经找到幕后黑手，殊不知，真正的黑手已经被“隐藏”起来了。

³⁷ 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迅速宣布于 5 月 14 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 6 月 24 日授权时任副首相敦阿都拉萨领导国家行动理事会维持社会秩序。（〈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当今大马》，2019 年 5 月 13 日，<https://pages.malaysiakini.com/may13/zh/>。）

（二）后“513”叙事

Baha Zain 的 *Mataku*³⁸ 为 513 发生后的未来找到了出路。虽然他并没有描述 513，但诗仍为后来的人民提供了新希望。他运用了彩虹的七种颜色，描述为“adalah warna dari satu cahaya”，印证了马来西亚人民，其实不论什么肤色，都应走出 513，毕竟大家都源自同一片土地——马来西亚。“Kerana betapa sejuaknya kita dipeluk malam”，无论多夜、多寒冷的夜晚，始终都会通过“warna-warna keras mau kucontengkan”缤纷色彩将为明天的早晨涂鸦。换言之，不论多么的恶劣，全马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目的就是为了要缔造更美好的明天。这首诗于 1970 年所写，虽并无明显的 513 成分，可是我们猜测诗人尝试在 513 后，寻找明灯，指引马来西亚人走出这段历史的伤痛。

马华作品当中，也有不少作品是在 513 后进行描写。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政治创伤³⁹。赖敬文的〈大浩劫〉⁴⁰就是 513 以后，回望创伤的诗歌。首节就谈及了“我们记得，在风雨中/甚至大海，那个不安的老人”，风雨可以指的是 513，“那个不安的老人”就是当时的政客因为“他会比你更安全的”。因此华人的不安，“所以大海能够嘲笑”，甚至是“如何去看，如何去听/你的面貌及声音”，以致华人无法认真去看和听 513 背后的历史事件。

当华社想要回想这起事件时，“全黑”、“饥饿”、“病患”、“挣扎和无助”等等都会再现在华社的脑海里。华社无法忘记 513 带给他们的痛苦与无

³⁸ Baha Zain, *Kumpulan Puisi: Siang Tak Pernah Mungkir Dan Kau Akan Dewas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15), 13.

³⁹ 513 使原本执政的集团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大马华人在经历了这场族群间的流血冲突，使华人的政治地位更加边缘化，也导致了这种创伤留在了大马华人的心里。诗人则通过暗喻，迂回曲折地陈述 513 带给大马华人的创伤。（郑政恒，〈五一三事件以后马华诗歌呈现的政治创伤〉，《变迁中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页 534-536。）

⁴⁰ 赖敬文，〈大浩劫〉，《蕉风》，1969 年第 6 期，页 26。

助。“阵阵的风是阵阵的联想”，每当想起 513，就是“小狗们孤独地寻觅他们失去地吠声/而且嗅着昂贵的人血”，政客失去他们的原则与支持者，而变成只会利用“人血”达到政治目标的人。

除了〈大浩劫〉，绿浪的〈伤口〉⁴¹也是华社面对 513 的领悟。513 带给华社“伤口”，这些“伤口”就是由“多刺的城”⁴²所导致。当这些“刺”刺过来的时候，因为华社“不及掩脸”，所以“鲜血已涓涓自双目流出”，华社根本来不及对 513 有更多的反应，就被卷入了这场暴动之中。更多的刺造成十分深的伤口，因此“而倒钩的箭如雨飞来/而月是磨损的银角/在所谓条规及秩序走过/伤痕就多一次损裂”，众所周知，513 后，为了稳固政权，政府提出《国家新经济政策》，损害了自由市场的运作，华社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更是大幅下降，这些不公的政策，就是“倒钩的箭”和“磨损的银角”，华社必须对“条规与秩序”服从，因此这些伤害就仿佛无止境地刺伤了华社。从 513 所造成的伤口，在未有机会磨合的情况下，继续伤害，使这伤口不曾愈合。

这三首都是在 513 后所出现的作品。马来作品中，希望忘却 513 的暴力，与其他族群一起建设与发展国家未来。他们认为 513 是政客的默许，暴徒才上街破坏，因此希望日后可以一起建立更美好的大马。华社的想法则与马来诗歌不一，513 后，因政府的管制，导致华社不敢发声，心中的这道伤口始终没有办法愈合。通过〈大浩劫〉和〈伤口〉就可以得知，在华社心目中，513 是一场对大马的大浩劫，也是一道刻在心底的伤口。

⁴¹ 绿浪，〈伤口〉，《蕉风》1969 年第 6 期，页 54。

⁴² 多刺的城，应该指的是就是当时“513”发生的地点，吉隆坡。如果宏观的看，也可以指的是马来西亚。因为下一句就是“多次的家”，因此这两种推断是合理的。

（三）想象、回忆、追溯 513

1987年，距离513已有约莫19年，发生了一场令华社感到恐慌的政治行动——茅草行动。于是，513的梦魇再一次出现在马华诗歌当中。傅承得〈惊魂〉⁴³当中就可以清楚看出513的影子。“三十年来家国，仍是/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由此可见，虽过了接近20年，但513似乎在华社最痛苦时，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之中。513，是无法忘记的痛苦，是无法忘记“洪水”如何掠夺许多“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多少百姓的生命在这次的暴动中丧失，而当时的“黑手”却还是“照样飞扬跋扈的横行”，导致华社对于513是“一道永不痊愈的疤痕。”虽已过良久，疤痕却不曾痊愈，烙印在华社的心中，无法愈合。诗末，513的影子再一次出现，“有人坐待黎明，有人/漏夜猛敲杂货店的门/或击碎百货公司的玻璃窗/因为一九六九年，据说/有人未及防范，所以饿死……”，就可以看出，诗人回想起当513发生时，有些人无法挺过那一夜，那一夜所失去的不只是国家的安宁和生命的流逝，更多是日后华社对未来与政府不安的心情。从中看出，虽〈惊魂〉写的是1987年“军人阿丹在秋杰路持枪大开杀戒⁴⁴”以及茅草行动⁴⁵，但诗人遇到类似的族群冲突与暴力事件时，都会想起513的事

⁴³ 鍾怡雯、陈大为主编，《马华新诗史读本 1957-2007》（台北：万卷楼，2010），页171-173。

⁴⁴ 〈弟弟被苏丹打死？ 军人妹妹辟谣〉，《东方日报》，2018年4月12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4/12/238993>。

⁴⁵ 茅草行动是时任首相兼内政部部长敦马哈迪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了约百名的政党领袖、华教人士、社运人士等，甚至关闭了“*The Star*”、《星洲日报》以及“*Watan*”等。

情。为了更形象化描述 513，他用“滂沱大雨”描写 513，仿佛到了一定的日子，总有人喜欢将 513⁴⁶再度提起。因茅草行动，513 才会和华社形影不离。

隔年的 1988 年，傅承得再一次将 513 请出来。〈因为我们如此深爱〉⁴⁷让诗人回忆自己十岁的时候，周围的人在 513 时所发生的事情。

但我十岁的时候

——那是一九六九年

左邻右舍，只要是同样的肤色

带着愤怒和惊慌，带着

木棍与柴刀，传递

孩童听不懂的消息：

“明天就要开始报复

至少他们也得血洒几滴”

只是小小的心灵，已蒙上

小小的恐惧与阴影

⁴⁶ 1987 年 10 月 17 日，时任巫青团团长 Najib Razak 带领巫青团进行万人大集会，集会中有人将“以华人鲜血染红马来短剑”、“5 月 13 日已开始”等的字眼写在布条上。惟，当 2009 年时，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国会时，遭到行动党已故全国主席卡巴星询问时，他否认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可是在茅草行动白皮书当中，证实了这句话曾出现在巫青团的大会。（〈纳吉是否有发表血染短剑论？安华推搪人不在现场不知道〉，《当今大马》2009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6686>。）

⁴⁷ 锺怡雯、陈大为主编，《马华新诗史读本 1957-2007》，页 176-178。

他记得那么清楚，主要是因为只要是“同样肤色”都会同仇敌忾，“报复”别人。这些话语留给诗人“恐惧”与“阴影”，因此在 19 年后的 1988 年，始终无法忘记这段“仍盘踞心中，不仅挥之不去/且不断成长，似要/吞噬这片美丽土地的上空”悲催的历史。当面对新的族群冲突时，诗人就想起小时候发生的 513，令他无时无刻都担忧自己的未来。他就是“因为我们如此深爱”，所以不愿再一次看到族群暴动发生在这个“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更无血腥，更无炮声”的国度当中。

吕育陶在他的〈只是穿了一双黄袜子〉⁴⁸中通过母亲告诉他，发生在他出生那年的事情。“我还藏在羊水动荡的子宫里/情绪高昂的马来鼓催促母亲的心心跳”，通过母亲，诗人才知道当时的情况。“国民同色的血液总安排在 5 月 13 日流出体外”，对诗人而言，当政客每一天都在宣示自己是团结人民的把手时，总会故意不提及 513，因 513 被排挤，政客选择漠视的一天。“当年械斗的巨响此刻邻人的哀嚎/掩饰风暴吹到管理不当的建筑与盆栽/恐吓国民集体奉献大河泛滥的选票”，513 始终成为恐吓人们的符号，也可以满足政客的利益。

此外，吕育陶的〈我的五一三〉⁴⁹，就写了“我分不清楚是战鼓还是心跳”，仿佛还在子宫里的诗人，不知道原来在母亲身外，正发生着一个令人绝望的暴动。各个地方的“噤声”，更是将诗人的童年蒙上阴影，因为“噤声的母亲”，到底是什么母亲不能告诉诗人？这令诗人思考，他不敢多问因“舅父的骨灰和许多被暗夜收割的头颅/在中学历史课本/简化成轻轻带过的一行文字”，没有敢去触碰这个历史的逆鳞，更没有人愿意去提起 513，因此诗人是带着一

⁴⁸ 吕育陶，《黄袜子、白辩书》（吉隆坡：有人，2008），页 67-70。

⁴⁹ 吕育陶，《黄袜子、白辩书》，页 74-77。

种害怕，一种惊恐的情绪去向其他人了解 513。他也知道，每一次大选时，“投我……，否则时钟/将回拨五月十三人/那年”，再一次证明，513 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工具。华社里头，513 是一道很深的伤口，根本无法愈合。

吕育陶的〈独立日〉⁵⁰中打算重启历史，颠覆官方对 513 的理解，要打造一种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和反记忆（counter-memory），⁵¹“父亲和华人缝在同一个伤口上”印证了父亲当时对抗霸权的象征。因为受害者埋进泥土内，“当年唯一的一次争执已然长大成一颗木麻黄”，受害者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以及检讨，只能够“在类似秋天的早晨，飘然凋落”。即便政府在日后提出各种的政策，但因 513 丧命的受害者，永远无法感受得到。借着私人哀悼，转换成公众哀悼，希望可以在反话语和反记忆的四周中，找出对他而言真实的 513。

（四）小结

马来诗歌主要是认为 513 是政治行动，并不会分裂族群。*Kambing hitam*、*Tangan-tangan yang tersembunyi* 和 *Mataku* 可以看出他们是尝试描写真实的 513 并希望后 513 的马来西亚可以通力合作，一起发展国家。可是在华社这里，马华诗歌却是一种创伤，一种〈大浩劫〉，甚至是烙印在心里的〈伤口〉。这种情况延续到了之后的 20 年，当茅草行动发生的时候，诗人再一次通过诗歌表

⁵⁰ 吕育陶，《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吉隆坡：大将，1999），页 128-130。

⁵¹ 张松建，〈家园、离散与身份政治：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东方文化》第 48 卷第一期，2015 年 6 月，页 148-149。

达 513 并无离开，让大家勿忘历史。因此〈惊魂〉〈因为我们如此深爱〉，都在诗中有意无意提起 513，直到吕育陶的〈只是穿了一双黄袜子〉〈我的五一三〉以及〈独立日〉，希望可以从诗中发现 513 的影响。众多的叙述方式，都在呈现缤纷色彩的 513，让读者认识正史以外的 513。通过了各种的现实抒情、后 513 的创伤，甚至是 513 对后代的影响，让后人了解官方不愿表达的 513。

三、意象的运用

意象是诗歌创作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政治诗也一样。做诗必须要情与景会，景与情合，才可以说是一首诗，这就是所谓的“情景交融”。⁵²情景交融，客观事物，配合作者主观想法，成为了“意象”。情景交融，涉及了外在“景”与“物”。这些外在的景物可以将他们统称为“物象”。“物象”只是拥有自身的特征，并没有带有特别的含义。生活中的草木森林、庭院建筑甚至是武器数字等，都是客观存在并不带有任何特殊意义。“513”，“mei 13”或“1969”只是一种数字，可能是一个日期。当这些日子落入诗人眼中，加上诗人情感表达，就形成一种有生命和灵性的文字。有了情感表达，这些物象才可以成为意象。

意象分为“意”与“象”，“意”就是主观的情感；“象”就是客观的景物。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到：然后使玄解之宰，寻神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⁵³就印证了这点，诗人的主观精神和客观景物汇合交融，正是“意”和“象”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文学的美。西方美学中的意象（image）则认为由两种因素构成，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⁵⁴这些意象是以表

⁵² 王德明，〈走向情景交融的认识历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页4。

⁵³（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493。

⁵⁴ 黑格尔认为美学的意象应该是象征的“意义表现”，应从其所暗示的广泛与普遍意义来看。（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页199-202。）

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不是很注重表现的手法，是这个表现手法带出的意义。⁵⁵我们也会在这个理论下探寻 513 诗歌里的意义。

（一）513、1969 作为数字意象

A. Samad Said 的 *Benih Harapan*⁵⁶用了数字“tiga belas kali”回忆了 513。“dan patahlah tiang bendera tiga belas kali/kijang jinak serta-merta tempang-tiga belas kali”旗杆象征的马来西亚遭到十三次的折断，鹿也在上面尝试起来了十三次。“tiga belas”的使用都让人联想到 513，诗人直接将 513 和国家财产结合起来，认为 513 使国家财产遭到剥夺，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吕育陶的〈只是穿了一双黄袜子〉就在“逼视历史课本”的节句中谈及“国民同色的血液总安排在 5 月 13 日流出体外”，诗中故意使用“5 月 13 日”就要让人们知道 513 所发生的事情。诗人也借“血液”表达了虽然大家都是流着同一个颜色的血液，可是却没有在 513 这天团结，而是进行分裂。

〈我的五一三〉从诗名就可以看出所使用的“五一三”。虽然诗人是在 1969 年诞生，可是却用了一个那么具有历史性日期的日期成为其诗名。“总有声音幽灵般从海报背面透出/ ‘投我……’，否则时钟/将回拨五月十三日/那

⁵⁵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 203-204。

⁵⁶ A.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Setengah Abad*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 2005), 121-130.

年”，五月十三日”代表了 513，也代表了族群分裂的那一天。政客为了获取选票，总是喜欢召唤 513。513 一直都是华社心里的伤疤，“淤积的心事/无法停下/定格一块五一三纪念公园”，这些伤疤无法愈合，只能匆匆在埋一块虚伪的“五一三公园”。

吕育陶的〈两种速度旋转的螺旋桨〉⁵⁷中将一万辆车辆进行分类，其中八百三十一辆（寓意国家独立日）提高引擎转速，象征马来西亚对外高唱的独立万岁，另外的五百一十三辆只能够“悄悄，放慢里程熄了灯/潜入邻国境内更换车牌”，仿佛是可耻的事件。诗人故意将“五百一十三”点名出来，目的就是希望政府和人民不要忘记 513，应谨记历史，避免 513 再度发生。“好让我拥有五百一十三个/毁天灭地的理由”，五百一十三个（理由），仿佛在提醒大家，如果不顺从执政者意愿，他们就会“毁天灭地”，而“五百一十三”就是一个很好的暗示，逆我者亡。这举动让读者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如同奴隶向霸权低头，让人民感到十分无奈和不满。

〈1969 年 5 月〉⁵⁸是吕育陶的图像诗。他用了三种不同日历的方式将 513 的噩梦带出来。在第一章“胜利一方的历史课本”中，将 5 月 13 日从日历拿掉，仿佛这一天不曾发生过。这与历史课本中将 513 蜻蜓点水般带过相似。政府将 513 拿掉，使人们不再了解 513，渐渐忘记 513。第三章“既得利益集团永远的谈判手段”中，5 月 13 日更是在之后的整个月不断出现。政客为了利益，不断

⁵⁷ 吕育陶，《黄袜子、白辩书》，页 81-84。

⁵⁸ 这首诗歌未出版，经作者同意后，才可使用。整首诗歌将会在附录中展示。

重复 513 带给人民的恐惧，使人民对他们的政策言听计从。一旦人民有异议，513 将再一次被“搬出来”，使人民支持与认同他们的政策。

（二）黑羊、隐藏的黑手作为象征意象

Usman Awang 的 *Kambing Hitam* 认为“Kambing Hitam”是替罪的羔羊。那么谁是那只可怜的羔羊？谁又是那个犯了错的羊？政客认为，真正的羔羊是“perkauman”（种族主义）、“komunis”（共产党份子）、“ultra”（极端分子）以及“gangster”（流氓）。事后的政府报告也印证了诗人的猜想。⁵⁹可是，政客的说辞，是否被大部分的人所接受呢？绝不，人民不应被这些政客言论所蒙骗，因受害者是无助的百姓。“rakyat si buruh si miskin gali kubur sendiri” 没有钱的百姓深受其害，只能自己的挖掘自己的坟墓，遗忘掉这些残酷的回忆。“ahli fikir negara merumuskan penyelesaian/ jamuan teh makan durian”，durian 就是榴莲。榴莲是果中之王，一种在马来西亚盛产的果实。513 发生时，“ahli fikir”竟提出了一个绝佳方法——那就是一起喝茶吃榴莲。政客们为了解决族群间的矛盾，用了榴莲做为团结国民的果实，联系了两个最大的种族。可是，这是政客丑陋的手段，因为“sesama mereka

⁵⁹ 在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中，国家行动理事会认为这场暴乱是因共产党而起。这是因为自日本投降以来，马来亚共产党（下称“马共”）对于政府的威胁一直都在，导致政府被迫在 1948 年实行戒严计划（darurat），对抗马共。因马共大部分为华人，又在与日本军对抗时收获武器，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并在二战结束后，与政府展开对抗。由于大部分的警军人员为马来人，在早期埋下了种族间隔阂的种子（Mageran,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Mageran);1969,7-14）。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 书中谈及，直到 1969 年 5 月 9 日（大选前一天），华社为劳工党党员 Lim Soon Seng 举行葬礼，并在送殡期间发与共产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传单予路人，甚至讽刺时任首相 Tunku Abdul Rahman，这引起了马来社会对共产思想的反感。这导致了联盟（perikatan）政府的险胜，反对党的人民行动党（DAP）和民政党（Gerakan）在华人较多的地方如檳城、怡保、吉隆坡等地取得大胜。（Abdul Rahman Ibrahim, *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aka);2015,81-86）

beritanya besar di akhbar mereka”,借大家一起喝茶吃榴莲，其目的是为了在各个新闻头面上抢得头条。虚伪的政客，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在人民的面前演戏。诗人讽刺了当时的政客，在达自目标后，假惺惺借“榴莲”（象征单一国族——nation）将 513 压下，埋在人民之中。*Kambing Hitam* 的推卸，配上“durian”的大团结，诗人借用了政客的话语，讽刺了政客。

此外，Said Zahari 在 *Tangan-tangan yang tersembunyi* 中将手运用成了意象。“tangan”本是手，诗人却将政客描述成隐藏的黑手，是制造、煽动 513 发生的隐藏之手。这一切只是为了“bertahan dalam kekuasaan”，保住自己的权利而已，并无顾及人民。此外，“Sebilangan kecil makan roti/ dan lain mengunyah pasir”，人们只能吃沙，而政客就可以在吃面包。人民吃沙（pasir），意味着人民面对贫穷，没有钱购买日常用品如食物因“沙”是免费的。诗人借“沙”讽刺了，人们水深火热之时，政客居然在谋划政变，甚至不惜赔上民族之间紧张关系，达到自己政治的目的。少部分人吃面包，意味着他们不会去管其他人的温饱，即便这些人需要“吃沙”。这种对比，让读者知道人民当时生活得情况。

“隐藏的黑手”和“代罪的羔羊”，二者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两者又相互对应的情节。两首诗都谈及了人们失去了温饱，一片饼干引起全家进行哄抢，大部分的人只能吃沙，他们都借用了这些较为低价的物品进行比较，这与其中政客在大吃大喝与少部分的人住在宫殿，穿着天鹅绒进行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

比也为这两首诗形成了特别的张力，很多百姓真实的感受就不需要特意去描写了。

（三）风雨、阴霾、都市的抒情意象

马华文学中，“风雨”的意象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意象，象征着阻碍、围困、压迫的负面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催化忧患意识的逆境。傅承得在〈惊魂〉就写到了“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泛滥成灾，洪水掠夺”。诗人形容 513 为了一场滂沱大雨，夺走了许多百姓的生命。大雨不需找出祸首和祸根，只知 513 将国家体制改变，华人不再与马来人平起平坐，成为了外来者。“滂沱”掠夺了无数的生命，可是谁是“滂沱”？在大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如何避免使用敏感字眼，以免遭到“滂沱”带来的影响。一场“滂沱”之后，发生的时间极短，可是影响却是长远的，人民甚至因为这场“滂沱”而日后权益遭到剥削，失去平起平坐的机会。“滂沱”就象征了华人在大马的不公。不只是“风雨”，〈惊魂〉中，也将也用阴霾象征 513。

“阴霾”，似乎象征了 513 的情况，因为烟霾总是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阴霾”也使大马人不可公开讨论 513，因一旦涉及敏感字眼或话题，就自然会被有关当局盯上，因此大马人离不开这个“阴霾”。人民无法拨开这层“阴霾”找到一片“晴空”，只能希望那场“滂沱”再来一次，期待将真相解开，人民就可以治愈“这道永不痊愈的疤痕”。“滂沱”与“阴霾”，

就是诗人对政局矛盾的心情，既希望借用“滂沱”将“阴霾”驱散；但又不希望“滂沱”再一次到来，不然更多的生命恐怕会遭“洪水”掠夺，失去更多。

Usman Awang 的 *Kambing Hitam* 就写道：“merah senja ibu kota/merah warna jalan raya/merah air sungai kelang/merah baju si anak malang”。这几句当中就有都门（Kota），马路（jalan raya），巴生河（Sungai Kelang）。这些看起来都是建筑以及一条普通的河流，却在诗人眼里有着不同的诠释。都门就是国度吉隆坡；马路象征着现代化与交通；巴生河则象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主要都是在巴生河流域一带。这些本来只是一个门、一条大路、一条河，却在诗人的手下，描绘吉隆坡作为大马经济最繁忙的地区，在一夜间染红，死伤惨重。当局并无处理 513，而由暴民发起暴动，只是在“Menteri demi Menteri di TV”。政客们上电视假意慰问人民，安抚人民情绪，并无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因此，诗人才认为“demokrasi sudah mangkat”。除了政客无动于衷，另外一个可以角度述说“民主已亡”就是部分暴徒不承认全国大选的成绩，失去了民主最珍贵的价值。

吕育陶的〈只是穿了一双黄袜子〉就说到：“……仿佛青天白日底下只有虫和蚁的选择……”，因为一旦不选择就会“……乌云将战机般降落城市峰顶……”，因为政客只是“虫”和“蚁”，身为人民的我们却没有办法从中做出更加好的选择，甚至是没有办法选择。一旦选择错误或不选择，“乌云”就会笼罩城市。诗人认为，只要选举结果不顺当权者的心意，国家就会再一次上演政治暴动，“推回土地流血的那一年，那一天……”，甚至“国民同色的血

液总安排在 5 月 13 日流出体外”，让人们有一种不分你我的感受。因此，不论“乌云”还是“虫”抑是“蚁”，这些都是象征马来西亚政治的缩影。吕育陶并没有直接写出 513 带给他与华社的影响，而是借用了这些自然意象，将自己看法寄托于其中，运用文字的美妙呈现出来。

（四）法令、牢笼等的批判意象

傅承得的〈因为我们如此深爱〉使用了“牢笼”“法令”，体现出 513 对人民的伤害。“但他们的满腔热血/命定冻僵在阴冷的牢笼/还有刀剑齐鸣的文字/都一一，在法令的烘炉/把锋利，化作烂铁和破铜”，513 后，政客为了确保自己日后可以安稳执政，制定了许多不公平的法令与政策，而其中最为显著就是新经济政策。当部分人民对此表达不满时，政客就会利用权利和“法令”将那些不满的人民送进去“牢笼”，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听话。“法令”与“牢笼”的使用，使政客不择手段地达成他们地目的。⁶⁰至此，我国便由国家行动理事会控制直到 1971 年国会复会。之后，政府便为了避免暴动的发生，积极推行各种法令⁶¹，控制人民。“牢笼”与“法令”就成为了政客对付异议人士绝妙的“武器”，人民的热血也就彻底“冻僵”在“牢笼”中。除了“牢笼”和“法令”，“木棍”和“柴刀”描述当时的情况。“左邻右舍，只要是同样的肤色/

⁶⁰ 513 后，有 9143 人遭到逮捕，其中 5561 人被提控违反宵禁而 45 人被控纵火与谋杀。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Majlis Gerakan Negara;1969), 100-101）。

⁶¹ 5 月 16 日所成立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暂停行使全部法令，可以制定临时法令并允许未审先判，将嫌疑人抓进牢笼当中。（柯嘉逊，《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513 解密文件》，页 96-98）此外，执政党大量借用内安法令（ISA）将许多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扣留 60 天并可长达最多两年，导致“513”以后，许多反对的声音都可以在这条法令下被控。诗人在 1988 年写下这篇诗歌时，正值 1987 年茅草行动发生，执政党使用了内安法令将这些异议人士抓捕。

带着愤怒和惊慌，带着/木棍与柴刀，聚集”，聚集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明天就要开始报复/至少他们也得血洒几滴”。由此可见，那时候，华人与马来人都是一样的愤怒，可是他们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政客对于族群问题不敏锐，放任暴民，使大家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对彼此产生猜忌与怀疑，导致了族群间的摩擦大爆发，造成了 513。

吕育陶在〈我的五一三〉也借用了“法令”进行描述。“绝望冷却的尸体以及/活人提问的嘴唇/一一被法令埋葬”，后人想要直到更多关于“513”，只能通过官方，无法知道更多的详情。如果要知道，可能就要被“法令”所控制，无法畅所欲言地公开讨论。因此，只可以“噤声”，在公开场合如“公路”、“军营”、“咖啡厅”、“电话亭”、“图书馆”都不能讨论，这样才可确保人民不会被“法令”所控制。此外，〈我的五一三〉使用了“标杆”做为意象。标杆，是跳高工具，却变成了一个标准。“不断地跨越，跨越/标杆后面/更高更宽的天空”华人需要更加努力地求学，更加努力地奋斗，就是为了得到进入政府大学的位置，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可是，“为何有人/可以私下绕过标杆/悄悄/被保送到我们向往的天空”，诗人发出了疑问。为何在大马，有一些人，可以通过“固打”的方式进入大学/政府机构，而另一部分却需要努力，需要奋斗才可以。诗人使用“标杆”取代了标准，取代了各族之间的公平待遇。这种“标杆”，源自 513，因为 513 发生的原因是族群间不平等的经济能力，导致部分国人担心“土地之子”地位受到威胁，因而希望政府干预，进而确保“土地之子”的位置是安全的。

这种情绪也在吕育陶的〈两种速旋转的螺旋桨〉写到，“公平的阳光下，/.../分解成两种上升的情绪/本村人/或非本村人”。政府为了确保“土地之子”的政治的利益受到保障，总是“永远有三十分/必须保留/且无私保留/给自持本村血统纯正/懒洋洋的铅笔。”政府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让“土地之子”的权利获得担保，这样当年的 513 就会不会再次发生。如果人民不遵守这些约定，“好让我拥有五百一十三个/毁天灭地的理由”，政客就可以再一次制造出 513 这只“猛兽”，人们自然只能服从政客的一切命令，不能做出反抗。一旦人民反抗，政府就可以再一次将 513 置入人民周围。“铅笔”在这里是懒洋洋的，可是却也在“破坏”一张白纸的结构，也影响着“考卷”的分数。“考卷”、“铅笔”这些都是测试一个人的能力所需要的工具，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经历过考试/考验的，而部分人却可以通过“血统的纯正”获得好处。513 保护了这张考卷，使那个“三十分”可以获得保障，而另外的就需要努力考取。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不论在马来或马华抒情诗，诗人借用了许多接近人民的物象，加上自己的主观情绪，连接上下文，使诗贴近大众，面向大众。不论什么样的意象，包括了数字，代罪羔羊或者隐藏的手，又或者是风雨、阴霾等的都市意象甚至是可以与政治挂钩的牢笼、法令的意象，都为 513 相关诗歌，谱写出精彩的一面。我们可以得出马来诗所使用的意象较中性，如“榴莲”、“沙”“道路”等；马华诗则使用较批判的意象，如“风雨”、“阴霾”甚至是“牢笼”、“法令”等。从这里我们得知，就是马来族群以整体而视这起 513，担

心 513 破坏族群间的融合，希望这起事件不再会发生。华人以一种悲观的情绪看待 513，写出 513 对华人利益的伤害，甚至因为后 513 的政策而遭遇不公的待遇，发出的悲鸣声。

经对比，513 对大马各大族群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满足了政客的利益和权利。马来诗从宏观的课题进行讨论，他们所使用的意象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公平和健康的生活环境，不轻易被政客所煽动。马华诗从尝试从 513 以及后 513 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借用这种悲伤的情绪借由外在的物象，进行描述。这种悲伤与反抗情绪在 1987 年茅草行动之时再一次被燃起。两种语言的诗歌都带出了团结才可以使马来西亚走上发展，可是政客为了自己的选票和利益，总是在利用族群间的摩擦，发表种族性言论，多次威胁要 513 再一次发生，使彼此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因此，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拒绝政客的恐吓，避免 513 再一次发生，这样马来西亚才可以早日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四、结语

本文从两个方向讨论了马华与马来政治抒情诗的 513 书写。首先，我们将视角放到了诗人们针对 513 的描写。513 是一个痛苦的记忆，只要人民不愿正视历史，就始终无法摆脱这段梦魇。诗人们尝试以回到案发现场、后 513 以及想象、回忆和追溯的方式对 513 进行叙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大多马华诗歌呈现了后 513 的创伤，马来诗歌在 513 是从直视历史到展望未来，慢慢走出“513”的影响。相较而言，马华诗人较为注重 513 所造成的伤痕，讨论事件对自身族群的创伤，却忽略了历史意识。若马华诗人可以更坦然地面对历史，并尝试从中找寻一些正面的启发，这些政治抒情诗或许就能超越文学的作用。

与 513 相关的数字意象在政治抒情诗中也不断出现。当中吕育陶更用用了数字以及月历组成了一首图像诗，让读者了解这组数字在马华或马来政治抒情诗的重要性。马华与马来诗人也将自己对体制的法令、民主等进行了批判，认为 513 是执政者借由体制鼓催暴动。马华诗人较为擅长自然意象，将风云、烟霾等加上自己的感受组成了 513 的抒情诗；马来诗人运用了概念的意象，隐藏的黑手、代罪羔羊这些暗示有幕后政治活动之意象。这些悲观的意象使用，也意味着大马并没有真正走出 513 的伤痛，而要改变这一点，也就只有勇敢地正视历史，接受历史，我们才可以走出历史。

我们希望通过马来与马华 513 政治抒情诗上找寻到 513 意识。每个人对这起事件有着不同的想法与讯息的来源，如果我们只是单一接受来自当权者的声音，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这起影响大马政治的族群事件。文学的 513 和社会与历史的 513 是一个复杂的交错。诗人运用自己的语言，加上自己对 513 认知，形成了独特的文学 513，这也成为讨论 513 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文体，甚至是不同的语言或者超越两种语言的认识将文学 513 描绘出来。通过与不同的文体和语言甚至是学科、民族和文化中试找出更多对于 513 的看法，找到 “马来西亚人” 多元的 513。

引用书目

一、专书

- 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吕育陶，《黄袜子，自辩书》，吉隆坡：有人，2008。
- 4.吕育陶，《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吉隆坡，大将，1999。
- 5.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柯嘉逊，《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八打灵：人民之声，2013。
- 7.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8.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9.钟怡雯、陈大为，《马华新诗史读本 1957-2007》，台北：万卷楼，2010。
10. Abdul Rahman Ibrahim. *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aka; 2011.
11.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Setengah Abad*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 2005.
12. Baha Zain, *Kumpulan Puisi: Siang Tak Pernah Mungkir Dan Kau Akan Dewas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aka; 2015.
13.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Majlis Gerakan Negara; 1969.
14. Said Zahari, *Puisi dari Penjara*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1973.
15. Tunku Abdul Rahman,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Limited; 1969.
16. Usman Awang, *Salam Benu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aka; 1978.

二、专章

- 1.陈平原，〈如何进入历史〉，《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页 61-67。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9。

- 2.李树枝,〈感时忧族(国):论“五一三”事件后,马华文学的“五一三”与“后五一三书写”〉,《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页 121-13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
- 3.荣光启,〈政治抒情诗〉,《当代文学关键词》页 123-124。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4.曾维龙,〈后五·一三马华文学的“诗性”与“正义”——马华文学史的另一种描述〉,《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页 415-441。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
- 5.曾维龙,〈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105-120。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 6.郑政恒,〈五一三事件后马华诗歌呈现的政治创伤〉,《变迁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与文学卷)》页 533-545。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

三、译著

- 1.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
- 2.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四、期刊论文

- 1.江伟俊,〈单元下的多元——马来西亚的语言权力状况〉,《马来西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17年第二期,页 9-22。
- 2.王昌忠,〈诗歌政治写作的合理路向〉,《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页 163-168。
- 3.王德明,〈走向情景交融的认识历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页 3-7。
- 4.张松建,〈家园、离散与身份政治: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东方文化》2015年第一期,页 127-154。
- 5.Florence Kuek,“Post-trauma: A Comparison of the Malay and Chinese Psyches in Response to the May 13 Tragedy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from 1969 to 2019”,*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49.7(July 2019):43-60.

6. Grace Chin, "The anxieties of Authorship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an Writings in English: Loca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Writer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dom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Postcolonial Text* 2:4(Jun2006):1-24.

五、杂志文章

1. 赖敬文, 〈大浩劫〉, 《蕉风》, 1969 年第 6 期, 第 26 页。
2. 绿浪, 〈伤口〉, 《蕉风》, 1969 年第 6 期, 第 54 页。

六、网络资料

1. 当今大马, 〈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 2019 年 5 月 3 日, 阅自 <https://pages.malaysiakini.com/may13/zh/>。
2. 当今大马, 〈纳吉是否有发表血染短剑论? 安华推搪人不在现场不知道〉 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6686>。
3. 当今大马, 〈政策使华裔感觉像二等公民, 马华看到在朝的必要〉, 2018 年 5 月 4 日, 阅自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23049>。
4. 东方日报, 〈弟弟被苏丹打死? 军人妹妹辟谣〉, 2018 年 4 月 12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4/12/238993>。
5. Polis Di Raja Malaysia, "Peristiwa 13 Mei", accessed Dec 12, 2020, <https://www.rmp.gov.my/infor-korporate/polis-diraja-malaysia/sejarah/peristiwa-13-mei>.
6. Harakah Daily, "13 Mei: Belajar dari Luka, Getir Sejarah, " Harakah Daily, accessed Oct 31, 2020, https://harakah_daily.net/index.php/2020/05/13/13-mei-belajar-dari-luka-getir-sejarah/.

附录 1：吕育陶〈5 月，1969〉

胜利一方的历史课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母亲节之后孩子被动物般宰杀的母亲日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3					

既得利益集团永远的谈判手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